

中国辩证法 史稿 第一卷

总编 萧萐父 本卷主编 李德永

本卷着眼于探源，着意于专新，以考辨史实、综述源流、剖析范畴、纵论思潮等论题形式，对远古至秦统一时期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和发掘。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辩证法 史稿 第一卷

中国辩证法史稿
第一卷
上古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著者：王德昭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年1月
开本：880×1230mm 1/16
印张：12.5
字数：350千字
定价：25.00元



中国辩证法史稿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辩证法史稿

第一卷

总 编 萧萐父

本卷主编 李德永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辩证法史稿

第一卷

总 编 萧萐父

本卷主编 李德永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6.375印张 417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精1—400

平1—1 600

ISBN 7-307-00359-7/K·29(精)

ISBN 7-307-00705-3/K·49(平)

定价：(精)8.50元

(平)6.40

第一卷

远古至秦统一

主编 李德永

弁　　言

对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进行史的清理和溯源，是一项浩繁艰巨的学术工程。十年前，我们开始提出“中国辩证法史”这一研究课题；当时的动念，直接基于对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中理论思维教训的痛苦反思。十年浩劫中最令人惶惑的思维教训之一是，我们这个夙称富于辩证智慧的民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胜利传播，却竟然陷入形而上学猖獗、斗争哲学横行的困境而一时无法自拔。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思索怎样走出这种困境，怎样拨乱反正，破旧立新，从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矛盾运动的深入总结中去重新开发民族智慧的资源。

十年来，我们择定“中国辩证法史”这一课题展开了初步探索，依靠集体努力，取得一些进展。首先，系统地编辑、整理了有关古代及近代辩证法史的原始文献资料，分篇作了提要和校注，共约百余万言，奠下一定的史料基础。其次，就辩证法史研究中如何确定对象范围以及史料筛选、人物择取、思想分期的原则等一系列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虽取得一些共识，但也留下不少疑难。在此基础上，分题定点，着手研究；同时，我们以此为专业方向培养了多届研究生，指导他们完成了《晚周时期辩证矛盾观之形成》、《吕氏春秋思维模式研究》、《船山易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熊十力认识辩证法初探》……等二十多篇学位论文。通过上述教学和科研的实践，特别是在“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教学相长及与许多师友“相观而善”的切磋中，我们逐步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扩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加深了对研究这一课题的难度和意义的认识，并逐步形成了

编写本书——三卷本的“中国辩证法史”的总体设计及指导思想。要而言之，约有数端：

一、在我国哲学文化的遗产中，辩证思维的发展源远而流长，思想成果特别丰富。但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往往偏重于清理按哲学基本问题所划分的哲学派别的对立、科学与宗教的纷争、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等，而对于作为发展观和方法论的辩证法以及可能渗透在文化意识诸领域里的辩证智慧，则注意探究不够。这就需要重新咀嚼以着重追踪历史上的辩证法为主旨的黑格尔哲学史观，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辩证理性思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特点，因而，为了实现专题史的特殊要求，不能停留在复述或摘录一般哲学通史中辩证法思想资料的水平，而必需重新厘定其选材范围、思想主流和矛盾发展的基本线索。

二、科学的中国辩证法史尚处于草创阶段。许多理论和方法问题尚待探索，应当以创新精神，找到新起点，开拓新思路，发掘新史料，创造新成果。诸如，我们民族智慧中的辩证思维，既区别于印度，又不同于希腊，而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和逻辑发展；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环，有其产生和衍变的普遍根据和特殊根据；它伴随着社会运动和哲学运动而推移、演进，既呈现出普遍规律，也有其特殊规律；作为认识成果的辩证法，也同样表现为一系列范畴和规律在历史上的依次出现并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得到理论总结，这就必须透过这些范畴和规律在不同哲学派别及哲学体系中的表现形态和特殊应用，而进一步发现其在人类认识史上的逻辑意义，并与科学形态的辩证逻辑的规律群与范畴体系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在论史结合、古今贯通的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历史上的辩证法的认识成果，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并非完全表现为哲学理论形态，而是以不同程度的抽象、多种形式的范畴表现于各种思想文化史料之中。中国历代的兵家、农家、医家都对辩证思维的发展各有其独特的贡献；在天学、数学以及

政治评论，文艺评论和学术史观中也往往闪耀着辩证智慧的光辉。这都有待于依据一定的取舍原则去进行筛选，提炼其广阔而丰富的内容。历史上作为认识成果的辩证发展观和辩证方法论，从来不是孤立存在、单维发展的，而是与各种非辩证的发展观、方法论以及相对主义、绝对主义、独断论、诡辩论等等处于对立统一之中，它们之间相反相因、涵摄依存、斗争转化，其形式是极为繁复而多样化，有待于认真探索其矛盾运动的具体规律。因而，应当充分估计到辩证法史在内容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要注意思想史的通则，更要注意专题史的特点，力避公式化、简单化。

四、根据以上这些认识，我们大体确定了本书的编写原则：

首先，由分题研究，定点深入着手，参酌全书的总体设计和积累的初步成果，拟出各卷不同层面的分题，进行定点深入的研究；强调掘井必须及泉，吹沙才能见金，反对“浮以求明”，浅尝辄止。所定之“点”，大体指作为专题史不同发展阶段及不同领域中的重点、难点、疑点、空白点以及思想运动的起落点、转换点等。经过分题定点的研究，然后由点到面，经纬成编。

其次，按社会经济发展大阶段分编，每编之中，以时代精神为经，以思想成果为纬，不求形式上的系统全面，而以专题、专人、专书以及综述源流、剖析范畴、纵论思潮、考辨史实等多样态的论题形式，组成每编内容。编中每个论题的大小、长短、繁简、虚实，不求一律，不拘一格；而全书各编贯注同一指导思想和同一方法论原则，则又统之有宗，隐然自成条贯。

再次，本书远非成熟之作，暂题为《中国辩证法史稿》，按历史跨度，粗分为三卷：

第一卷 远古至秦统一

第二卷 秦汉至明中叶

第三卷 晚明至“五四”

本书虽经十年来断断续续的集体琢磨，但目前仍然只能以一种粗糙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由于集体执笔，视角各异，思路文

风，更难强同。读者自会发现本书作为集腋成裘之作，必多驳杂不一之论，正是这一特点，也许可以启发读者用多元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历史的诠释，坚持“殊途百虑”的学术史观。这也是中国辩证法思想遗产留给我们的慧解之一。

中国辩证法史的系统研究，无疑地会有助于激发我们民族的智慧生命，继承我国丰厚的思想遗产，促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但应看到，历史上强大的辩证思维传统，对于我国思想现代化的现实作用却具有复杂的二重性。这就是：我国哲学传统中朴素形态的辩证法（以及早被引入认识论的朴素实践观），作为最珍贵的遗产，确实丰富多采，且发展从未中断，这对于接受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作为“革命代数学”的辩证法，显然是特别优越的条件和极为方便的桥梁。但这只是已被证实的历史投影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近代及其哲学革命的难产，自先秦名学中衰以来，形式逻辑、数学方法等知性分析始终得不到发展，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大都是醉心于朴素辩证法的优秀传统，并机智地用来诠释和附会近代的进化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就不自觉地跳越了人类认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致使作为感性具体的朴素辩证法，没有经过知性分析的逻辑阶段，未能摆脱贫认识的直观性和朦胧性，而直接羼入了把握理性具体的科学形态的辩证思维。这种被忽视了的历史投影的另一面，有可能使我们忘记了使现代科学思维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生根、发展必须培育丰厚的思想土壤，有可能使科学形态的辩证思维在特定条件下返祖、退化、变质。因而，科学地研究中国辩证法史，既要充分发掘，系统总结我们民族智慧中辩证思维传统的光辉的理论成就和历史贡献，同时也要冷静分析、如实评估其根本局限；尤其对于我国朴素辩证法传统的优势及其现实投影的二重性，更要结合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思想历程，作出严肃的历史总结。至于传统思维模式中貌似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诸形态，更需要察其表里，辨其疑似，作出认真的评析。

引 论

本卷的历史跨度包括奴隶制从产生（公元前30—22世纪，炎、黄之际到夏王朝的建立）、发展（公元前21—8世纪，夏、殷、西周）、衰亡并转化为封建制初步形成时期（公元前8—3世纪，春秋、战国至秦统一）。放眼当时神州大地正处在斗争融合的历史剧变中，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人际关系乃至人们的社会理想、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学术文化亦从“学在官府”、“庶人不议”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诸子百家“列道而议”、“分徒而讼”，经过争鸣走向新的兼综融合。在分流发展而又多源汇合这一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形成的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潮，迎着世习时风的跌荡起伏，波翻浪涌，千姿百态，闪耀出夺目的思想光辉，凝聚着深邃的民族智慧。这是我国古代文明从黎明破晓走向日丽中天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一个无愧为在世界文化史上独具一格、“创业垂统”、成就了伟大思想业绩的“轴心的时代”。

对于先秦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自本自根、独立发展的辩证法思潮，如何追溯其源头、清理其流程、把握其动向？这是本卷着意探求的问题。

以土为本的农业文明是中华民族辩证智慧滋生繁衍的最深厚的土壤。自古以来，大陆大河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农业型自然经济虽然没有把我们的先人引向蔚蓝色的海洋，但发展农业的强烈刺激却推动我们的先人仰观俯察，“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中庸》第三十章）扩展了视野和思维空间，发展了以天文学、地学、农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辩证自然观。本卷以较多篇幅介绍的阴阳思想、五行思想和天地人三者统一的朴素系统论思想就是

这种辩证自然观的三个典型。从认识根源来分析，阴阳消长的思想来源于“相其阴阳”（《诗经·大雅·公刘》）的天象观测；五行生克的思想来源于对方位、季节和地材的考察和运用；而“为之者人”、“生之者地”、“养之者天”的朴素系统论思想则反映了发挥“人为”力量来“辨土”、“审时”夺取丰收的农业活动特点和要求（《吕氏春秋·审时》）。这种植根于农业文明的辩证自然观经过历代哲人的不断提炼、加工，抽象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被运用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的矛盾运动以及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显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恢宏气度和辩证智慧；但这种长于总体把握、短于具体分析的辩证自然观一经变形、放大为固定的思维框架，就用臆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企图通过想象来比附天人关系、编制历史周期，虽然也吐露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天才思想，却走向了荒谬和神秘。先秦辩证自然观的这种二重性鲜明地反映了被农业文明所制约的思想特征。

以礼治国的宗法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辩证智慧滋生繁衍的又一最深厚的土壤。根深蒂固的宗法血亲传统发展了“文理隆盛”的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功用职能在于以“乐”之“和同”维系“礼”之“别异”，即用“亲亲”血缘关系维系“尊尊”等级秩序。正是制礼作乐的社会实践突出了对立统一的关系问题，引起古代哲人对社会矛盾运动的深沉思虑，发展了不同类型的辩证矛盾观。儒家贵和，提出了以和谐论与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中庸观。他们虽不否认变化，但强调以常为本来驾驭变化，虽不否认矛盾，但强调以和为贵来缓和矛盾，虽不否认变革，但强调以因为主来掌握变革。他们眷恋温情脉脉的血亲纽带，在“两端”激化的矛盾中“执两用中”（《中庸》第六章），防止事物由极端走向转化。强调矛盾双方的依存、联系，强调和谐、稳定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儒家中庸观的重要特征。道家贵柔。他们“见小曰明”（《老子》第五十二章），善于从“孝慈”的外貌

窥见“六亲不和”的内幕（第十八章），从钟鼓玉帛的热闹场景觉察走向冷落衰败的微小契机，从肯定中发现否定，第一次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的矛盾观，认为事物从正反相依走向正反转化具有客观必然性。在“道——德——仁——义——礼”交替代谢的序列中，维系血亲宗法传统的“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三十八章），崩溃之势已成，一切有为均无法加以挽回。从时代前进的步伐中，他们看到了“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的客观辩证法；但“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的观点却过分夸大了“守柔”、“不争”在矛盾转化中的策略作用，缺乏积极进取精神。法家尚争。在战国末期法治代替礼治的“大争之世”，法家代表韩非用犀利的眼光考察历史和现实，无情揭露了血缘宗法传统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他提出了以强调对立性为理论特征的“矛盾之说”（《韩非子·难一》）。他不仅认为“万物各异理”（《解老》），而且把这种相“异”的对立性尖锐化为“不相容”（《五蠹》）、“不两立”（《显学》），“不并盛”（《解老》），“不同道”（《扬权》）的“两端”，主张通过“疾风大雨”式的斗争加速以新代旧的发展进程（《亡征》）。他的矛盾观有夸大对立性，忽视同一性的片面性，但非和而尚争，非柔而尚力，充满了阳刚之气和生命之力，在先秦辩证法史上独放异彩。

植根于深厚土壤中的先秦朴素辩证法是民族智慧的活水源头，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从更深的理论层次和更新的角度重新探求和开发。本卷在撰写时，着眼于贯通，着手于深细，着意于专新，力图摆脱以往教科书四平八稳的固定模式，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所研究问题的开展和深入方面：如从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历史特点和夏、殷文献的考辨中发掘哲学思维的萌芽，企图把辩证法史的发脉起源追溯到文明来临的初期。又如充分估计到古代文化多元发展的特点，突破以一个问题（如天人关系问题等）贯穿始终，排斥其它的封闭构架，而广泛地探求自然辩证法、农业辩证

法、军事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认识辩证法等的多方开展；特别是考虑到百家争鸣时期哲学思维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对某些专入，专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作了新的探索。再如以人类认识之网的“纽结”——范畴作为对象，对“五行”、“阴阳”、“一两”、“中和”诸范畴各自独立的纵向发展及其互相融汇的横向联系作了动态研究，借以究明辩证思维发展的逻辑进程。最后，有些篇章还根据哲学遗产更新改造的原则和当代中外文化融合之势，对这一时期具有理论形态和历史影响的一些哲学体系和思维模式，剖析其内在矛盾，评估其理论得失，目的是为了从历史反思中求得启发和教益。

目 录

引论.....	(1)
古史祛疑.....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从考古新发现看我国文明史的开端.....	(4)
三、我国奴隶制形成的历史特点及其在古文献中的反映.....	(14)
试论我国宗族奴隶制和哲学发端史的历史特点.....	(25)
一、古老的宗族奴隶制.....	(25)
二、曲折的哲学发端史.....	(29)
夏殷文献中辩证思维的萌芽.....	(37)
一、夏时与夏政.....	(37)
二、卜辞间风雨与《洪范》论九畴.....	(44)
《易经》中的辩证智慧.....	(51)
一、对偶卦组显示的对立统一思想.....	(55)
二、关于事物变化发展的思想.....	(58)
三、关于事物总会向反面转化的思想.....	(61)
四、关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思想.....	(64)
五、关于发挥主观努力促成事物变化的思想.....	(66)
我国哲学发端时期(夏—春秋)辩证思维的萌芽和 发展.....	(71)
一、古代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71)
二、《洪范》论“五行”.....	(74)
三、《易经》论阴阳.....	(82)
四、史伯、伯阳甫论“和同”与“阴阳”.....	(88)
五、史墨论“一两”.....	(92)
六、孔丘论“中庸”.....	(97)
先秦儒家中庸观剖判.....	(104)

一、先秦儒家中庸观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渊源………	(104)
二、先秦儒家中庸范畴的哲理化………	(108)
三、先秦儒家中庸观的思想特征………	(117)
墨家辩证法 ………	(125)
一、社会观中的辩证法思想………	(126)
二、自然观中的辩证法思想………	(134)
三、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	(139)
惠施、公孙龙辩学钩沉 ………	(153)
一、名辩思潮与名家………	(153)
二、惠施的辩学………	(159)
三、公孙龙的辩学………	(168)
论《老子》“玄鉴”与“静观”的直觉主义认识论 ………	(183)
一、《老子》直觉主义的认识对象………	(183)
二、《老子》直觉主义认识论的途径与特征………	(190)
《庄子》哲学中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 ………	(195)
一、宇宙衍化论………	(196)
二、齐物论………	(208)
三、是非论………	(218)
四、逍遥论………	(228)
五、关于《庄子》哲学中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	(243)
《管子》辩证法探微 ………	(258)
一、“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	(258)
二、“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	(261)
三、《管子》辩证法的评估………	(269)
先秦兵家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	(272)
一、“安国全军”的战略思想………	(273)
二、“因敌制胜”的战术原则………	(276)
三、“知彼知己”的决策思想………	(281)
四、“必攻不守”的进攻意识………	(285)
先秦农家学派的农业辩证法思想 ………	(290)
一、耕战结合的“尚农”政策………	(292)

二、合理使用土地的“任地”原则.....	(295)
三、精耕细作的树艺方针.....	(298)
四、“时至而作”的“审时”思想.....	(301)
先秦法家政治历史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306)
一、“万物各异理”的矛盾分析法.....	(307)
二、“不法古、不修今”的历史进化观.....	(311)
三、“不相容之事不两立”的社会矛盾论.....	(318)
四、“法”、“术”、“势”相统一的治国理论.....	(329)
五、法家辩证法的历史评价.....	(335)
先秦自然科学与辩证法发展.....	(338)
一、先秦辩证自然观的文化土壤.....	(338)
二、古代天文学与阴阳思想.....	(342)
三、古代地学与五行思想.....	(347)
四、古代农学与天地人相统一思想.....	(354)
五、古代辩证自然观变形与放大的历史思考.....	(359)
先秦朴素系统观刍议.....	(361)
一、关于有机整体的观念.....	(361)
二、关于层次与联系的观念.....	(366)
三、关于动态与平衡的观念.....	(369)
四、关于结构与功能的观念.....	(372)
五、关于先秦系统观的评估.....	(374)
百家争鸣与荀况“解蔽”.....	(377)
一、荀况思维方法的理论特征.....	(377)
二、对天人问题的总结.....	(385)
三、对名实问题的总结.....	(394)
四、对性伪问题的总结.....	(404)
五、对群分问题的总结.....	(410)
六、对古今问题的总结.....	(416)
阴阳数度之学与邹衍.....	(423)
一、“旧法世传之史”的“数度”之学.....	(423)
二、“《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429)

三、《易传》和邹衍	(434)
《易传》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438)
一、“天地𬘡缊、万物化醇”的宇宙发展观	(438)
二、“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变化内因论	(440)
三、“穷上反下”、“革故鼎新”的矛盾转化思想	(443)
四、崇尚“正中”、注重“太和”的中和之道	(445)
五、“见几而作”、“与时偕行”的能动性思想	(449)
六、《易传》的形而上学归宿	(452)
晚周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	(454)
一、关于“五行”范畴的动态研究	(455)
二、关于“阴阳”范畴的动态研究	(460)
三、关于“中和”范畴的动态研究	(465)
四、关于“一两”范畴的动态研究	(471)
五、晚周文化的大融合	(479)
六、《易传》是晚周辩证矛盾观形成的标志	(483)
七、晚周五行、阴阳、中和、一两诸范畴运动的个性与 共性	(489)
《尸子·广泽》、《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 子》与《吕氏春秋·不二》中的真理史观的异同	(493)
一、“无相非也”的求同取向	(493)
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存异取向	(496)
三、“务息十二子之说”的排他取向	(500)
四、“齐万不同”的超越取向	(504)
后记	(508)